

工资上升、劳动力短缺与刘易斯拐点幻觉

李刚

(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安徽蚌埠 233030)

摘要: 很多学者在运用刘易斯模型分析中国劳动力短缺和涨薪潮问题时, 不但忽略了该模型存在的一些缺陷, 而且还误解了其中的一些重要观点, 误以为中国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 形成了刘易斯拐点幻觉。判别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主要依据应该是两部门实际收入差距和劳动生产率的变化, 而不是现有文献常用的名义工资的变化。经验数据表明, 近几年来中国两部门实际收入差距增长缓慢、劳动生产率呈现出扩大趋势, 因此, 中国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

关键词: 刘易斯拐点; 剩余劳动力; 劳动力短缺; 收入差距

中图分类号: F24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49 (2012) 06-0039-07

Wage Rise, Labor Shortages and Illusion of Lewis Turning Point

LI Ga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Bengbu 233030, China)

Abstract: As many experts and scholars with Lewis population flow model analysis the problem of labour shortages and wage rise on China in recent years, not only ignored some flaws of the model, but also have misunderstood some of the important points, misconception that China "Lewis turning point" has come and formed "Lewis turning point" illusion. Distinguishing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whether the arrival should be based primarily on the real income gap between the two departments and labor productivity changes, rather tha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commonly used nominal wage changes. Empirical data show that China's real income gap of the two departments slowly growth and labor productivity showing a expanding trend between 2002 and 2010. Therefore, China's "Lewis turning point" yet to come.

Keywords: Lewis turning point; surplus labor; labor shortages; income gap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2004年初, 中国深圳、东莞等珠三角地区率先出现了用工荒问题, 随后便波及长三角和环渤海

收稿日期: 2012-06-13; 修订日期: 2012-08-14

基金项目: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城市土地模式研究”(12BJL064); 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土地资源与城市化双重约束下的城市精明增长研究——三端控制的视角”(09YJC790004)。

作者简介: 李刚(1971-), 安徽太和人, 安徽财经大学副教授, 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 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湾地区。2011年用工荒现象更是蔓延至安徽、河南、陕西、四川等中西部地区。随着中国用工荒现象由局部演变成全局性问题，农民工工资也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上升。但是在工资上升的同时，中国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并未能有效消除。许多专家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解释和争论。就现有文献而言，对此问题的争论和解释大体上可以分为总量说和结构说两类。

在总量说中最有影响力的解释是蔡昉教授提出的中国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的观点。他认为由于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中国劳动人口无论是相对数量还是绝对数量都将相继出现下降，劳动力短缺不可避免^[1]。他还通过预测人口结构的变动来论证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和刘易斯拐点到来的判断^[2]。王德文结合农民工工资变化，大致做出近年“民工荒”意味着“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判断，并得出了中国已经越过第一个刘易斯拐点的结论^[3]。周立从城市化和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视角，根据中国近年所出现的民工荒和农民工工资上升趋势，综合判定中国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4]。但是立足于总量分析中国劳动力短缺的研究并非都同意蔡昉等专家学者的研究结论。汪进、钟笑寒利用跨国数据将中国人均GDP和农业劳动力比重与世界平均水平进行对比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仍有较大潜力^[5]。丁守海基于家庭分工的视角，认为中国一方面拥有较大规模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劳动力的供给呈现出短缺的状态，二者的不协调主要在于农民工对工资上升反应不敏感^[6]。王金营、顾瑶通过测算中国未来劳动力的需要和供给，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劳动力转移的第一个刘易斯拐点大约出现在2015~2020年前后^[7]。

结构说主要从中国人口结构发生变动来解释劳动力短缺现象。这类研究大多认为目前中国所面临的情况是：人口老龄化问题逐渐显现，青年劳动力所占比重呈现出下降趋势，而中国企业仍然坚持使用青年劳动力的用工模式，导致青年劳动力供需失衡。只要企业改变用工模式或提升劳动力素质，目前中国所出现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就会得到缓解，因此，刘易斯拐点并未真正到来^[8-10]。

无论是总量说还是结构说，抑或其他方面的研究，由于研究方法和视角的不同，导致双方各持己见，争论不休。产生争论的根本原因在于众多的专家学者都把分析的焦点集中在剩余劳动力数量和工资的变化方面^[11]，试图据此来推测中国的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到来。

在面对许多学者惊呼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和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的论断时，我们不仅要问：中国的人口分别是美国和日本的4.3倍和10倍，而GDP只相当于美国的40%，和日本相当，为什么美国和日本却没有出现用工荒呢？为什么和我们人均GDP相当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没有出现用工荒呢？弄清楚这一问题对于中国人口政策的走向将有重要影响^[12]，因为目前已经有许多专家学者依据中国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的结论开始呼吁政府要放松计划生育政策了。鉴于此，本文试图在厘清刘易斯人口流动模型的要义的基础上，指出其存在的缺陷和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判定标准，并揭示中国刘易斯拐点幻觉出现的原因。

二、“刘易斯模型”与刘易斯拐点幻觉

1. “刘易斯模型”要义

早在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在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下，以农业部门的制度工资和剩余劳动力假说为基础，提出了人口转移与经济发达的“刘易斯模型”。后来经过拉尼斯和费景汉(G. Ranis & John C. H. Fei)等学者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完善和发展，形成了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简称刘-拉-费模型)，其核心要义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一个假设。无限劳动供给是刘-拉-费人口流动模型的前提条件。按照刘易斯的解释，所谓无限劳动供给是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在一个固定的工资水平上能得到所需的任何数量的劳动供给。由于发展中国家农业缺乏资本投入，农业劳动生产率极低，导致农业人均收入水平也很低，一般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被称为“制度工资”)，人口却增长迅速，因此，农业中剩余劳动力规模巨大。而城市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高于农业部门的收入水平，农业人口若不受限制，就会向城市流动。

在发展中国家，农业人口所占比重大，而且劳动生产率低下，只要工业部门扩张生产，就可以按现行工资水平雇佣到任何数量的劳动力。

(2) 两个部门。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一个是以农业部门或农村部门为代表、以传统生产方法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极低的非资本主义部门；另一个是以工业部门或城市为代表、以现代方法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相对高的资本主义部门。经济发展依赖现代工业部门扩张，而农业部门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劳动力资源。

(3) 三个阶段。在刘 - 拉 - 费模型中，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显性剩余劳动力转移阶段。显性剩余劳动力是指边际生产率等于零的农业劳动力。这部分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不会引起农产品总产量的减少和粮食的短缺。农产品总产量不减少，工业部门工资水平就不会提高，从而工业部门的劳动供给是无限的，供给曲线是水平的。如图 1 中的水平供给曲线 SB 部分所示。第二个阶段为隐性剩余劳动转移阶段。在显性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之后，农业部门还存在着一些劳动边际生产率大于零但小于农业劳动者的平均收入水平（制度工资）^[13]。将其从农业部门转移出去，虽然对农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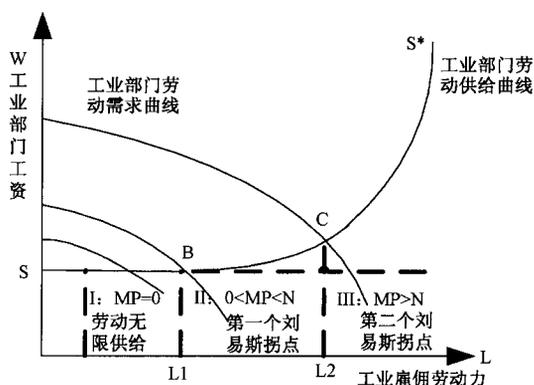


图 1 刘易斯 - 拉尼斯 - 费景汉模型

总产出的影响不大，但还是会导致农业产出略有下降和农产品价格的温和上升，所以第二阶段工业部门的劳动供给曲线是缓慢上升的，即图 1 中的劳动供给曲线 BC 段所示。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交界处就是第一个刘易斯拐点。第三个阶段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完毕阶段。在该阶段，剩余劳动力消失了，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再也不是由“生存收入”决定，而是由劳动边际生产率决定。劳动边际生产率高于不变制度工资，因此，这一阶段农业部门的工资高于不变制度工资。由于农业的工资水平上升了，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必须上升得更高，否则，农业劳动力就不会转移到工业部门^[14]。因此，第三个阶段的劳动供给曲线上升得更快，如图 1 中 C 点之后的部分所示。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交界处被称为第二个“刘易斯拐点”。

2. “刘易斯模型”的缺陷

刘 - 拉 - 费模型自诞生之日起，便饱受争议^[15]。首先，他们把农业部门看做是静止的，不但否认农业制度工资的变化，还否认农业技术进步的存在，认为在经济没有转化为一元经济之前，农业发展处于停滞状态。这显然是不符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现实的。其次，两个部门工资决定机制是不相同的。农业部门工资是由“生存收入”（制度工资）决定的，而工业部门工资是由劳动生产率决定的。但是当经济完成一元经济转变的一刹那，农业部门的工资决定机制也突然由“生存收入”决定变为由劳动生产率决定，这一转变又是如何完成的，刘易斯认为是隐而不见的^[16]。第三，工业部门“按固定不变工资水平上可以得到所需的任意数量的劳动力”这一假设很难得到满足。因为随着农业部门劳动力逐渐减少，劳动的边际产出在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作用下不断提高。一旦提高到制度工资水平，农业部门就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农业部门也就不再鼓励劳动力转移，而是按边际报酬支付工资，积极地与工业部门争夺劳动力^[17]。对于这些内在缺陷，人们在使用该模型时往往忽略了，以至于成了导致刘易斯拐点幻觉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3. 刘易斯拐点幻觉产生的原因

从刘 - 拉 - 费模型可以看出，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由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转移的根本动力是两部门间的实际收入差距。而实际收入差距又与每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相联系。因此，实际收入差距和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就应该成为判断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主要依据。由于其他外在因素也可能诱发实

际收入差距的上涨，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因此，实际收入差距的上升只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刘-拉-费模型认为，当二元经济转换为一元经济时，两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将趋于平衡，这将促使两部门的工资水平趋于一致。如果此时工业部门继续扩张而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会引起劳动力在两部门间重新配置，并导致工资的上升。因此，两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趋于一致则是判断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充分条件。

目前，学术界普遍采用的判断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标准有两个：一是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大幅度下降；二是农业工资率大幅度上升^[18]。这些判定标准存在着明显的错误。第一个标准实际上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同义语。因为刘易斯拐点到来本身就意味着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大幅下降甚至消失，因此，这在逻辑上犯了循环论证的错误。对于第二个标准，农业工资率的上升未必一定是劳动力的转移造成的，还有可能是农业外部条件的变化引起的，如农业税的取消和中央惠农政策的实施等，也可能是农业技术进步引起的。因此，使用这两个标准判断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是值得商榷的。

正因为刘易斯人口流动模型本身的缺陷和对刘易斯拐点判断标准把握不准，才产生了刘易斯拐点幻觉。具体分析如图2所示：如果将刘-拉-费模型中农业生产率不变的假设放松，那么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传统部门的制度工资也会上升。表现在图2中就是制度工资由 A_0 上升到 A_1 ，为了保持两部门间的实际收入差距不变，农民工外出打工的工资收入至少应该由 W_0 升至 A_1 ，但是如果农民外出打工的工资收入仅上升到 W_1 ，这会使农民工收入下降，进而导致两部门实际收入差距缩小，使得劳动力供给曲线由 W_1S_1 变为 W_1S_2 ，此时就表现为在务工工资上升的情况下，劳动力供给减少，以至于出现“用工荒”。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很多人仅仅依靠刘易斯模型中“当剩余劳动力消失时……，工业部门要想得到更多的农业劳动力，就不得不提高工资水平”^[19]的观点，结合劳动力供给不足的事实，轻易地得出了中国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的结论，以至于出现了刘易斯拐点幻觉。其实，此时的劳动力供给不足是由于两个部门实际收入差距降低导致的，而不是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争夺劳动力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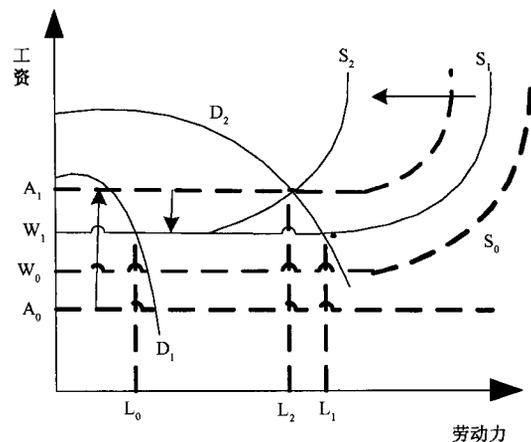


图2 工资上升的不同情况

三、经验分析

1. 实际收入差距和劳动生产率变化

在认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或已现端倪的学者中，他们作出这一判断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农民工工资已经大幅度上升，即“涨薪潮”的出现。由于刘易斯在该理论中假设农业生产率是固定不变的^[20]，也就是说，农业部门中的劳动力的收入是不变的。然而，中国的实际情况是：中国在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下降的同时，粮食产量连续8年获得丰收，2011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57121万吨，创造了新的历史纪录，达到了2020年粮食产能规划水平^[21]。这说明中国农业生产率是在稳步提高的，因此，农民在家务农的收入也是在提高的。所以仅仅依靠农民工务工工资的提高无法透视中国民工荒问题的全貌，应该采取农民工外出务工和在家务农收入之间的差距作为其标准（见表1）。

由表1可以发现，除了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低工资法》的实施和2006年国家统计局将价格基期由2000年调整为2005年的原因造成实际收入差距变化较大以外，其余各年的实际收入差距增

长远低于农民的制度工资的增长幅度，有的年份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从总体上看，2002~2010年间，中国两部门实际收入差距增长缓慢。

2. 劳动生产率变化和剩余劳动力的测定

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表明，当发展中国家的剩余劳动力消失时，传统部门（农业部门）和现代部门（工业部门）的工资均由边际生产率决定，根据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推断，此时，两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应该是均等的。但是中国的实际情况（见图2）显然不支持这种结论。图3表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从1990年代初期以来总体呈现出逐渐扩大趋势，这意味着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也在扩大。因此，我们初步认为目前根据“用工荒”和“涨薪潮”判断中国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的结论是一种幻觉。

至于中国究竟存在着多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不同的学者测算的结果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蔡昉估算出2005年中国的剩余劳动力大约为5000万^[22]，而钱文荣、谢长青利用调查数据却认为2005年中国剩余劳动力大约在7465万人^[23]。赵显洲测算的结果表明2000~2005年间，中国剩余劳动力存量呈现出不断上升趋势，其中2003~2005年间基本上保持在1.9亿人左右^[24]。造成估算结果悬殊较大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采取了不同的计算方法。其中蔡昉等人运用官方数据和农民工平均工资加速上升作为估算依据，这一方法把农民工务工的工资上升作为吸引农民外出务工的依据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吸引农民工外出务工的不是工资收入，而是实际收入差距。钱文荣、谢长青的估算思路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主要取决于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扣除农村第一产业需求量、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中在校学生数、农村第二第三产业使用劳动力数量的余额。该方法受制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不得不使用其他指标进行替代，这无疑降低了结果的可信度。赵显洲却是参照英国肯特大学瑟尔瓦计算贫困人口的方法，把“贫困线”替换成农户的收入目标进行计算。使用计算贫困人口的方法来估算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的思路是值得质疑的。

为弥补上述计算农村剩余劳动力方法上的缺陷，我们依据世界各主要国家第一产业就业比重来估算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规模。这样做的理由是：刘易斯拐点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25]，因此，参考其他国家的数据来估算中国的剩余劳动力，避免了仅就个别国家进行研究，而缺乏一个客观参照系的弊端。具体做法是，首先，计算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28个主要国家的第一产业的平均就业率，并计算出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的差距；其次，根据中国在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和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的就业率差距，计算出中国农村还能释放出多少劳动力。计算结果见表2和表3。

从表2可以看出，尽管中国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在近几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但依然远高于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平均水平。按照世界平均水平推算，中国2009年依然有7000多万劳动力可以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见表3），意味中国的刘易斯拐点还未到来。这与蔡昉等人的研究结论明显不同。

从表2可以看出，尽管中国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在近几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但依然远高于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平均水平。按照世界平均水平推算，中国2009年依然有7000多万劳动力可以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见表3），意味中国的刘易斯拐点还未到来。这与蔡昉等人的研究结论明显不同。

表1 2002~2010年农民工外出打工与在家务农的年均实际收入差距

年份	务工名义工资		务工实际收入		制度工资		实际收入差距	
	数额	CPI	数额	增长率	数额	增长率	数额	增长率
2002	7908	101.7	7776	—	2476	—	5300	—
2003	8424	101.2	8324	0.07	2722	0.10	5602	0.06
2004	9360	103.9	9009	0.08	3136	0.15	5873	0.05
2005	10500	101.8	10314	0.14	3555	0.13	6759	0.15
2006	13856	101.5	13652	0.32	3987	0.12	9665	0.42
2007	14880	104.8	14198	0.04	4540	0.14	9658	-0.01
2008	16080	105.9	15184	0.06	5261	0.16	9923	0.02
2009	16599	99.3	16716	0.10	6053	0.15	10663	0.07
2010	17004	103.3	16460	-0.02	6900	0.14	9560	-0.10

资料来源：“务工名义工资”来源于《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各期）；CPI和“制度工资”用《中国统计年鉴》（各期）中的“农民纯收入”指标替代而得；“务工实际收入”的数额和增长率、“制度工资”增长率、“实际收入差距”的数额和增长率由作者计算而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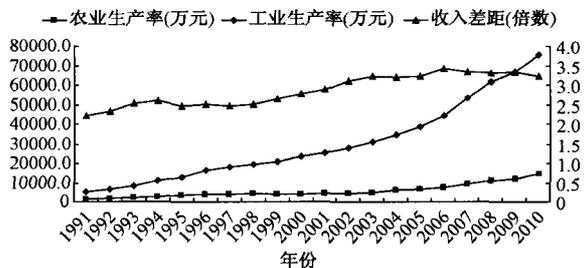


图3 中国1991~2010年生产率、出现收入差距变化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期，其中城乡收入差距倍数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而得。

表2 2000~2007年部分主要国家农业部门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

%

年份	2000	2001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中国	50.0	50.0	49.1	46.9	44.8	42.6	40.8	39.6	38.1
世界平均	14.8	15.8	12.3	13.5	12.6	12.1	12.0	13.0	13.9
二者的差距	35.2	34.2	36.8	33.4	32.2	30.5	28.8	26.6	24.2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5~2011各期),其中世界各国农业部门平均就业率和中国偏离平均水平差距为作者计算而得(缺少2002年数据)。

表3 中国农业部门就业比重下降到平均水平所能释放出的劳动力数量

年份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就业总人数(万人)	35269	33970	32561	31444	30654	29708
中国农业就业比重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	33.4	32.2	30.5	28.8	26.6	24.2
可释放的劳动力数量(万人)	11780	10938	9931	9055	8154	7189

资料来源:“就业总数”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年和2008年)。

3. 中国刘易斯拐点幻觉

依据上述分析可知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了这样一个悖论:一方面,中国存在着一定规模的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在工资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却无法消除“用工荒”现象。我们可以运用实地调查数据来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这里所使用的数据是从2007年开始,利用安徽财经大学学生开展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时获得的。该活动分别在安徽、河南、四川、重庆、江西、湖北等省市各选100个家庭作为抽样家庭,每年进行一次追踪调查,一直坚持到2011年,所获得的数据应该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客观性。具体数据见表4和表5。

表4显示,从2007年开始,户均留守劳动力的规模总体上呈现出上升局面。这主要是留守劳动力不愿外出务工的比重上升造成的。从表5中可以发现,导致留守劳动力不愿外出务工的经济原因源自于务工收入和在家务农收入的实际差距小于期望差距。

表4 农户结构、外出务工意愿及务工收入

年份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户均留守劳动力(个)	1.61	1.50	1.62	1.66	1.65
留守劳动力不愿外出务工的比重(%)	0.307	0.296	0.310	0.309	0.318
务工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	0.618	0.637	0.615	0.600	0.604

表5 农民外出务工的期望收入差距

年份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期望的实际收入差距(元/年)	9824	10692	12719	13382	14954
期望的实际收入差距增长率(%)	-	0.088	0.190	0.052	0.117
实际收入差距的增长率(%)	-	0.027	0.075	-0.103	-

运用表4和表5可以解释刘易斯拐点幻觉在中国出现的原因。首先,在中国依然存在较大规模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由于农业科技进步和中央惠农政策的实施,使得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大幅度提升,导致家庭经济状况好转,并使其在面对雇佣劳动机会时,有足够的勇气去拒绝这些机会^[26]。其次,外出务工的实际工资增长缓慢,使得务工和务农收入差距缩小。实际收入差距的缩小,导致人们外出务工的意愿下降,因此,在中国目前农民工工资上升的情况下,出现了民工荒现象。

四、结论

刘易斯的劳动力流动模型是发展经济学中著名的人口流动模型,后来的许多发展理论诸如拉尼斯-费景汉模型等都是刘易斯模型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但是存在着如把农业看做是处于停滞状态、城市工业部门不变工资作为分析的基础等缺陷。许多学者在运用刘-拉-费模型分析中国劳动力流动问题时,一方面,忽略了这些缺陷的存在;另一方面,对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判定标准把握不准,以至于出现了刘易斯拐点幻觉。在厘清该理论缺陷的情况下,对于中国剩余劳动力及其流动的问题,我们得出了如下结论。

首先,以世界各国第一产业平均就业比重作为估算依据,中国目前拥有7000多万的剩余劳动力,这部分剩余劳动力目前还依然未被城市部门所吸纳。根据中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8年较快增长的事

实,可以说明目前劳动力的转移并未影响到农业生产,因此,随着中国农业技术的持续提高,还将继续释放出一定规模的剩余劳动力。

其次,在目前中国农村尚有一定规模的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城市出现了“用工荒”和“涨薪潮”。这些现象的出现主要在于:一方面随着农业生产技术进步的推广,农业生产效率也在提高,使得农民务农的收入提高;另一方面城市工资提高的幅度较小。在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使得农民外出务工和在家务农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收入差距的缩小降低了部分农民外出务工的积极性。

尽管目前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尚未真正到来,但是“用工荒”却对经济发展,特别是对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要消除这些影响应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增加务工者的实际收入水平,鼓励更多的剩余劳动力顺利转移到工业部门。另外,加强对务工者的劳动技能培训,提高其劳动生产率,也是提高其收入水平的主要渠道之一。

参考文献:

- [1] 蔡昉. 劳动力短缺: 我们是否应该未雨绸缪 [J]. 中国人口科学, 2005, (6).
- [2] 蔡昉.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 [J]. 经济研究, 2010, (4).
- [3] 王德文. 中国刘易斯转折点标志与含义 [J]. 人口研究, 2009, (2).
- [4] 周立. 刘易斯拐点已现: “民工荒”与“涨薪潮” [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2011, (3).
- [5] 汪进, 钟笑寒. 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理论辨析与国际经验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1, (5).
- [6] 丁守海. 劳动力剩余条件下的供给不足与工资上升——基于家庭分工的视角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1, (5).
- [7] 王金营, 顾瑶. 中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形势及未来变化趋势研究——兼对中国劳动市场刘易斯拐点的认识和判断 [J]. 人口学刊, 2011, (3).
- [8] 白南生. 刘易斯转折点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 [J]. 人口研究, 2009, (2).
- [9] 钱文荣, 谢长青. 从农民工供求关系看刘易斯拐点 [J]. 人口研究, 2009, (2).
- [10] 翟振武, 杨凡. 民工荒: 是刘易斯拐点还是伊斯特林人口波谷 [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1, (8).
- [11] 同 [3].
- [12] 孙自铎. 中国进入刘易斯拐点了吗 [J]. 经济学家, 2008, (1).
- [13] [美] 德布拉吉·瑞著, 陶然等译. 发展经济学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334.
- [14] 郭熙保等. 发展经济学 [M]. 北京: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9: 193-194.
- [15] 朱晶, 李天祥, 李琳. 迁移成本, 工资上升与刘易斯拐点——一个对刘易斯转折点分析框架的再探讨 [J]. 农业经济问题, 2011, (9).
- [16] [日] 速水佑次郎, 神门善久著, 李周译. 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74.
- [17] 宋世方. 刘易斯转折点: 理论与检验 [J]. 经济学家, 2009, (2).
- [18] 同 [3].
- [19] 同 [14].
- [20] 陈宗胜. 发展经济学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259.
- [21]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2011 年我国粮食总产量登上 5 亿 5 千万吨新台阶 [EB/OL]. http://www.gov.cn/gzdt/2011-12/02/content_2008854.htm.
- [22] 蔡昉, 都阳, 王美艳.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新估算及其含义 [M] // 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NO. 9.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 [23] 同 [9].
- [24] 赵显洲. 关于“刘易斯转折点”的几个理论问题 [J]. 经济学家, 2010, (5).
- [25] 同 [5].
- [26] 同 [6].

[责任编辑 方志]